

## 談笑無還期

--彭歌先生訪談錄

廖玉蕙 2002.11.27.

「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；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；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」

彭歌先生書寫的王維<終南別業>詩，被攤展在書房的桌上，彷彿正替主人代言著。曾經在台北文壇及媒體上炙手可熱的彭歌先生，在訪談結束後，一身輕便地為我們介紹著樓上書房裡的擺設及照片。我特別被這一張他親筆書寫的文字所吸引，渾厚的筆跡裡，似乎密藏著某些他所未曾言宣的情緒。「談笑無還期」，到底是瀟灑？抑或惆悵？是識透人生況味後的不羈？還是深情付出後的惘然？

略顯發福的彭歌先生，口才依舊便給。我們從人事滄桑談起，話題遍及新聞、政治，專欄、小說，甚至戲劇，對我們提出的當年鄉土文學論戰問題，也並未迴避。雖然不言悔，卻又說：「照現在的想法，就讓別人去談吧！」語氣淡然。

牆上的字畫，張張有來歷，透露出主人過往生活的繁華；飯廳桌上，一個哈密瓜、幾枚水蜜桃和橘子，外加一盤圍棋，則訴說著繁華過後的平淡。窗外，是藍色尼羅河百合及各式各樣的仙人掌，側門的走道旁，紅豔豔的美人蕉對著經過的訪客花枝招展地巧笑倩兮！當主人笑著說道：「盡洗鉛華悔少作」的時候，不經意間，我彷彿瞥見一抹落寞落在眉間。

離開姚府時，已過了七點。天色依然透亮，風，卻不客氣地翻動我們的衣領。

廖：前幾天，我們在洛杉磯拜訪了王藍先生，他身體狀況不是很好，心情有些低落。提到最近老友相繼凋零，譬如鹿橋、陳庭詩、劉其偉、林海音…給他很深的感慨。

彭：年紀大了，這種感受最深。尤其是海音的過世，恐怕對我們兩人心情的影響都很大。當年，我們都住在光復南路、延吉街那一帶。王藍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，他這個人的特色就是他自己願意為朋友做一切事情，他也希望朋友對他一樣的熱心，所以他交友很廣闊。精神不好，我想大概跟心情也有原因。我最近都沒有去看他了，老朋友生病，心情很難過。海音過世倒是沒想到的，

我前年回去看她，那時候好像還好嘛！就是記憶力稍微差一點。沒想到就這樣走了，所以，你們年輕人多做一點也對啊！能做的時候做，不能做的時候想做也做不動。

廖：真的很讓人感慨！其實，這幾位前輩不管在文學或藝術界都是很重要的。

彭：過去，我們常談「中國人為什麼沒有人得諾貝爾獎啊？」等到高行健，一百年才有一個，我想這跟整個大環境有關。國內比如說左右的觀念啦，像現在統獨的意見不一樣，因為見解不一樣，所以，有時候，你好我也不承認你。譬如我們這一代，大陸的人認為魯迅的文筆不得了，我們這邊有人就說魯迅沒什麼了不起！我們這邊覺得胡適、林語堂好，他們那邊也覺得不怎樣。這樣子，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一個共同的想法，你叫外國人能夠怎麼辦呢？所以，到最後，高行健還是等於外國人替我們爭取的。有人講文學和藝術實在應該分開，其實這不是很容易的，有某些文學也許是可以，但大多數文學牽涉到人生，牽涉到人生，就免不了有政治意義、見解。你看王藍的《藍與黑》，應該算是相當具代表性的作品，以前也改拍成電影。我們那一代有同樣經歷的人，大概都會有這種感想，也不是說特別愛國，而是說國家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好像分不開了。像我們這夥兒升大學要公費，假設沒有國家照顧的話，根本不可能。別說上大學了，連生活都有問題。從北方到重慶，王藍比我早幾年，比我大幾歲，今年他應該也八十幾歲了。

廖：紀剛先生比他年紀大，可是，看起來身體要好一些。就是他帶我們去看王藍先生的。

彭：紀剛身體好，可能跟他是醫生有關係，而且是小兒科醫生。他很樂觀，剛剛到美國以後，就跟我說：你現在為什麼不把筆會在這兒重新組織起來？我說：不了！搞了那麼多年，很累的，而且情況也不同了。

廖：的確是不一樣喔！整個時代的變化太大、太快了！尤其我們在學校教書感受特別深。像您剛剛講的這個愛國情操，就差很多，現在的年輕人比較崇尚個人主義。

彭：其實這倒也不只是台灣，全世界幾乎都是一樣。這也是沒辦法的，生活教育

就是這樣，到以後，就是吃一點兒苦、跑一點兒路，恐怕都沒辦法了。

廖：您在 1977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，引起了鄉土文學論戰。事隔多年以後，您介意再來談談這一段歷史嗎？

彭：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。其實論戰要真正把一件事搞很清楚，不容易。因為，所有的論戰到最後都會變成很情緒化的，你攻擊我、我攻擊你，到最後都會離開本題！我那時候主要的一個想法是，台灣需要安定、民心需要團結，文學不應該做為政治的工具，尤其是不要做共產黨的工具。那時是 1977 年，大陸文化大革命剛過後，以前你可以講國民黨多麼腐敗、多麼壞，但無論如何，國民黨最壞的時候，也沒有像共產黨那麼壞。有很多資深的共產黨，以前我們的朋友，在大陸都遭遇了很殘忍的遭遇，在台灣，這應該是很好的教育。

廖：如果我沒記錯，您在那篇文章裡，批評了幾個人？

彭：在那篇文章裡，我批評了三個人，主要是陳映真。一直到現在，陳映真還是這樣。他一直說共產黨怎樣的好、美帝不對等，我覺得現在你更不應該講。因為連蘇聯都垮了，東歐整個垮了，北韓、越南微不足道，只剩下一個中國大陸，你看中國大陸現在是用怎樣的辦法？像深圳加工區、吸引外資、和外資合作……，這就是台灣在 1960 年代開始起飛時用的辦法。假使他們早走這個路子，我相信台灣老早就完了。我在國際筆會的中間幾年，我們的處境非常艱苦，東歐集團的共產黨總共八票，討論任何問題，只要一句涉及台灣，他就是要想辦法打擊你，最好把你排除。另外，文學界左傾的人很多，包括我們有些很好的朋友，譬如：南美的人就相信社會主義，覺得社會主義好。請他們親自到台灣來看，看了以後，就瞭解了，實際改變他們的觀感。當時，我們好像在外面拼命打仗，陳映真卻還在國內講國民黨不好，共產黨好，讓我覺得非常難過。我在文章裡面舉的例子，他們始終沒辦法反駁。例如：1950 年代，台灣光復不久，大陸淪陷了，省主席陳誠找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來，讓他請中外的專家來做一個預估，假定台灣一年沒有地震、颱風，沒有大的災害，台灣的米能夠有多少、能撐多久？這個最要緊！如果飯都吃不飽，還

談什麼反共！各方面估計後，最樂觀的是產米 150 萬噸。但是，後來過了十幾二十年後，台灣的產米達到 250 萬噸，而且還吃不完，得想辦法外賣給日本。台灣的土地比二十年前減少，因為工廠蓋多了，人多了。農民人數減少，可是糧食增加了，而且超過當初最樂觀的估計 100 萬噸以上。我覺得這不是農民出汗就有辦法的，這是因為整個科學界的農業改進、病蟲害防護，水利增進，政府社會的調配農會怎麼借錢給他。我想你居住的中部農村，這個現象很明顯，如果還抱怨這個社會不好、現實怎麼樣，實在不公平。

廖：您好像還抨擊了王拓？

彭：是還有一位王拓，我現在有時在報紙上常常看到他的消息，我倒很高興。為什麼？那時他是很年輕的，還沒畢業，寫文章分析台灣的經濟情況，蔣經國還跟他也談過。我覺得他現在當選立法委員，已經跟大學生不一樣了，因為現在已經真正負責任啦！譬如，前一陣子，陳水扁先生聘任宗才怡女士作經濟部長，大家都覺得她不夠。王拓是黨團負責人，他就直接點名宗才怡應該辭職，這就多多少少保持一點青年人的那種正氣。如果這樣，我就沒什麼好反對的。就我來看，政黨輪替等等，是一個很正常現象，沒什麼了不起！國民黨幹得不好，在野黨就上來；在野黨上來以後，也要幹得更好，不比前面更好，馬上又要輪替了，美國情形也是這樣。沒什麼哪一黨！今天稅繳得少，生活過得好，我就支持那一黨；失業了，大家都找不到工作，下回我就由共和黨變成民主黨。我想，如果真正的正常化來說，都沒什麼大關係。所謂鄉土不鄉土，少數人利用這個議題，走得很激烈，什麼外省都是豬啦，這一類的話，有的人聽了以後心灰意冷。當初從大陸到台灣來，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來的。但是到了這個地方以後，至少我們所認識的人裡邊，很少有人分你是外省、我是本省，我們要怎麼樣、怎麼樣的，其實整個環境好了，大夥兒都好了嘛！海音我們最清楚了，當初我們一家三口住一間房，她們家一家五口住兩間房，後來慢慢大家都好了。她能夠住到翠亨大廈，我到光復樓這邊，我們都常常回想以前艱苦的日子，我們也沒有機會去貪污、去搞什麼名堂，就是一個字、一個字的寫，去努力，好好工作。

廖：現在，您回想起來，對這場論戰感到後悔嗎？

彭：假如照我現在的年齡，也許就根本不談鄉土文學這個問題，因為究竟是責備別人總會引起反感，就變成一種爭論，爭論最後又沒有結果，對社會到底是好是壞，我也不知道。也不是說後悔，就是照現在的想法，就讓別人去談吧！

廖：現在是到處都在談，言詞更加激烈，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。

彭：你想，你是中國文學系的，你就會瞭解。譬如在台灣，你就要弄一個台灣文學，這就好比山東人、河北人就要都弄一個文學。沒有這個必要，也不大可能嘛！台灣文學沒辦法把它孤立起來。台灣有很多老先生，比我們更老的，像台大的教授黃得時，他就說他的父親根本不會講國語，可是，他念詩、念古文，都是中國的東西。這位老先生很有意思！

廖：您早年寫作小說、專欄文字，是當年很多年輕朋友的偶像呢！有一段時間，比較少看到您的作品，最近似乎又稍稍寫得多些？

彭：退休到這裡來已經有十一、二年了，國內同輩的朋友都老了，有的都離開台灣了；年輕的一代來往比較少，不是很瞭解。像你，是看到我寫的東西，才想起我這個人。寫作也是一樣，有人在背後催著、逼著，自己也覺得很高興。現在是覺得，寫了一輩子，寫出來結果又怎麼樣！對整個社會有多大影響也很難說。不過，看了很多前輩還在努力，想想也不能太消極。

廖：最近寫的好像也都跟時論有關係？

彭：跟世界日報寫寫，偶而在聯合報上。我現在倒是很想幫中央日報寫文章。從報上看到中央日報從三百多人裁員到七八十人，滿心痛的，幸好還是留下來了。

廖：您曾經在中央日報做總主筆？

彭：先做總主筆，然後做五年社長，前後十幾年。中央日報那棟大樓就是在我任內蓋起來的，那時候蓋大樓真是萬分艱苦，公家機關財力有限。

廖：您以前也寫長篇小說，現在寫長篇小說的，都慨嘆比較少園地可供發表，而一般的大眾也比較沒耐性看長篇小說。

彭：我在這裡很方便，兩岸的東西都可以看見。我們從台灣來，對台灣總是有種期望，只要兩邊比較起來東西差不多，我們就說台灣的好，但差太多就不行。很多過去的歷史劇、現代劇也好，大陸確實比較好。這裡租帶子滿街都是，雍正王朝、康熙帝國，我聽說台灣有些都在演了，台灣在文化上拿不出東西來，這就麻煩了。

廖：確實！台灣的電視劇，幾乎都被大陸的劇作攻佔，晉文公、康熙、雍正等大製作，比台灣本身拍攝的精細了許多。台灣還在私生子、換孩子、撞車失憶、甩耳光、下跪等不理性的情節裡打轉！

彭：故事大家倒還覺得無所謂啦！但是對話上好像沒有一點真實感。

廖：可是，這樣的俗濫故事，也確實有許多死忠的觀眾喜歡看！沒辦法。一切為收視率！曲高就合寡，電視不做沒有錢的事。

彭：全是為了錢就不行，其實你做好的東西，也有錢嘛！也不見得就一定賺不了錢，但是得多方去試探，試探一些新的。我有一個願望，常常聽國際上講，說台灣的影片好，我在這兒就看了《臥虎藏龍》、《悲情城市》，但是，後來還有好多得獎的，好像台北都看不到，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人看到？

廖：現在變成一些比較小眾的電影欣賞，電影資料館、文化大學推廣部都在想法子做。前陣子，也辦了些專題式的講座和播映些主題式的電影。譬如侯孝賢、王小棣、楊德昌等導演的作品，也都還吸引一些年輕人去欣賞。偶而也會邀請我們一起看，看完，舉行座談來促銷，用討論方式來引起大家的興趣。

彭：你回去也可以好好反應、反應我們這樣的意見。從海外回到台灣，留的時間當然不會太長，不管那個影片，中國影片、台灣製作，得了大獎，我們看看，心裡高興，我們也曉得有哪些好的人。有位邱復生製作的電影《活著》，劇本、演員全是大陸的，張藝謀導演的，很好。張藝謀曾到我們這兒來，記者去訪問他，問他覺得自己的電影哪一部最好，他說《活著》最好，只可惜大陸不能上演。但是因為大陸不能演，我相信中國人興趣也不大了，因為大陸的市場最大。但是那部電影太好了，也不是親共產黨或親國民黨，真是看出來中國人的痛苦。

廖：你可能因為待在台灣的時間不夠長，沒能去找。出租錄影帶的地方，若仔細找，應該還可以找到。有一些很好的電影常常是叫好不叫座，錄影帶店裡可能因為沒什麼人借，就提前下架了。

彭：這裡的文化競爭也很厲害的，像此地有一個叫「南海」的地方，我看應該是共產黨辦的藝術中心，也辦活動，請一些音樂家來演出，或舞蹈什麼的，然後，就賣一些書籍、雜誌，台灣的書他也賣，不過就像是李敖、璩美鳳啊這些的，正經東西很少。主要是賣大陸的書，現在大陸的書好的也有一些，可惜像張賢亮那一批人，現在都不寫了，大概現在生活好了，苦悶少了。

廖：大陸作家剛開始被引介到台灣時，可能因為新鮮感，很受歡迎。現在就比較不是那麼受注目了！現在在台灣比較引起注意的是王安憶、余秋雨和莫言。

彭：王安憶很不錯，比較老的像湛容。

廖：剛剛聊天時，您提到還是有一些題材可以寫的。目前有沒有計劃再重提小說之筆呢？

彭：現在寫小說的興趣比寫評論高一點。寫評論就像是我們兩個談話一樣，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你，也許過一陣子，情況變化以後，別人就不一定有興趣了，小說也許可以長遠一點。我們這一代，有人講中國人「花果飄零」，其實，我很喜歡一個德國作家雷馬克，他很有意思，他說二十世紀的特色是，整個是難民世紀。儘管生活也許不是難民，但心理上卻是難民心態，總是覺得：第一沒有安全，第二總是有點兒缺乏的地方。現在物質生活也許不虞匱乏，但精神卻有很大的空虛。台灣六〇年代經濟起飛以前，大家都窮，把錢都看得很重。有句口號說：「人無一個錢，地無一寸荒。」一點點的地，都要把它利用。但是現在想想又不對了，把環境都弄壞了，很難的。我想寫作的朋友，對眾人、對自己以外的人，沒有一點兒的關懷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我小學剛畢業到 1945 年那段時間內，心裡面唯一的事情，就是希望把日本人打垮。從北京到後方去，唯一願望就是就希望考空軍官校。可惜眼睛不行，人家不要，後來做別的事。但是，心裡上還是一樣，想說這麼大的國家為什麼老是被日本人欺負！在初期，我對台灣沒什麼印象；對台灣的了解是在大

學二年級，讀連橫先生的《台灣通史》，才了解台灣原來跟我們關係那麼密切。沒想到後來會有一天，在台灣住了幾十年。到了台灣，也沒想到有一天又到美國來住。一步一步的，人好像隨這個浪潮一樣，流浪嘛！

廖：這麼說來，您還是會繼續寫小說？

彭：有可能。不過，年紀大了，怕沒有從前的勇氣了！現在變成有點兒眼高手低。看雜誌報紙上別人寫的東西，老覺得這種東西何必寫出來！美國現在出了一個給老年人看的大字版雜誌，亂七八糟的小說，看十本，難得有一本還可以，很無聊！無論技巧或意識，都沒什麼意思。可是自己一個字、一個字地寫就……。

廖：您太客氣了！您以前寫的作品還真多！除了翻譯以外，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評論，翻譯版的小小說寫作，門類很多？

彭：使命感談不上，能做點什麼事，就做點什麼事。另外，今天這個朋友辦個出版社，明天那個朋友辦個雜誌，最好笑的是，一九七〇年，寫作比較旺盛的時候，一個朋友說：「你們幾位先生寫的東西，寫在紙上、丟在地下，馬上就是錢！」出版商就用這種說法來誘惑我。可是，那能對讀者這樣呢！還是得好好寫。寫作雖然沒什麼進步，但是，在我心裡總是把它當作一個很神聖、很重要的事情。我現在有時也幫他們寫社論，寫社論就要各方面的意見都照顧全。現在就是看很多這些個東西，也很有意思。美國的事情比較亂，金融風暴啊、阿富汗、九一一驚爆……這些事，平常談過就完了。現在寫評論，就必須多瞭解一點。但我想評論以後又怎樣，我也天天看紐約時報，對社會發展也沒有多少正面的影響，乾脆寫自己的東西，把自己的想法留在那裡。社論就像日本人所說的「浮世繪」一樣；自己寫文學創作，好像真的雕塑東西一樣，好壞是自己的。

廖：我們都知道您是學新聞的，採訪寫作當然是一定要的，但是，當時怎會想要去寫小說呢？

彭：初到台灣來，當時，報紙篇幅都很少，兩大張、三大張，一個記者、一個編輯，一天能夠寫個千字見報就不容易了，多出來的時間，自己就把當時的感

觸慢慢寫出來。現在看起來，是盡洗鉛華悔少作，不成熟啦！

**廖：身兼作家、報人、教授多重身分，您比較認同哪一種身份？**

彭：也說不上，主要的時間恐怕還是新聞比較多吧！本來還想計劃一些時間寫東西，但是後來實在是不可能，尤其責任變重了以後，完全身不由己，出門就不曉得我今天下午要幹什麼，這裡要開會，那裡要開會的，忙得沒有辦法。我做了中央日報社長以後，林海音女士家裡常有外地或海外來的朋友去吃飯，邀我一塊兒去。有兩次，我答應了一定去，結果也去不了。她等了很久後說：「彭歌啊！你再這樣，我以後不跟你玩兒了！」慢慢的，自己私人的朋友的來往都沒有了，都是公事。一天晚上吃幾頓飯，很不文學！

**廖：您有沒有計算過自己到底出版了多少書？**

彭：大概算過，八十本左右。三民書局最多，聯合報也有。我在聯合報寫三三草，一個禮拜寫三、四篇，每半年幾乎就可以出一小本書。三民叢刊從開始到後來一共有兩百多本，我的就佔了十幾本。出版界的朋友，跟我們有來往的，像三民的劉振強先生，海音當然原來就熟，另外，有一位張清吉先生，新潮的，比林海音年紀還大，非常了不起。那時候他辦了出版社，自己通日文，他雖然沒有很好的學歷，但是很喜歡讀書，而且都讀好書，哲學、歷史、文學的，他不能讀原文，從日文裡選，大概也就是岩波文庫之類的，然後找人翻譯。不過，初期因經濟不是很好，翻譯的人有時候找在大學讀書的研究生，有的好、有的不好。他們也很努力，但有時候很生硬，也有錯誤的。但是他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。新潮文庫裡面沒有不好的書，不管是社會科學的，文學的書，幾乎都是第一流的。

**廖：可不可以談談您的讀書經驗？看起來您的閱讀似乎是十分廣泛的。**

彭：廣泛閱讀的原因，有時候也並不是你自己要，而是工作逼著來。在比較先進國家，它可以用很多的專家，譬如紐約時報的科學記者，美國有關原子彈發展史就請他來寫。我們中國報界沒有這種人材，花多少錢都找不到這種人材，只好自己來。一方面當然也是興趣比較廣泛，多接觸一點社會問題。我倒覺得讀書裡邊，最大的樂趣也不一定是學到什麼或解決什麼問題，就在那

個時候很 enjoy。在中國文學範圍裡，有蘇東坡、杜甫、陸放翁的詩文，有時候覺得他幫我們講出來我們心裡想要講而說不出來的，而且講得很好。

廖：創作者最大的快慰也就在這裡，能讓讀者產生共鳴，或對讀者的思想、生活有所豐富、提升。

彭：做新聞記者的，在這一面往往有比較所謂功利性的 function，希望這個報導寫出去以後，馬上轟動，或是這個評論出去，大家都能接受這個觀點。但是做文學家的，就只要把我自己心裡相信的東西寫出來，聽不聽是你們自己的事。如果偶爾有一、兩個知音，那當然最好；沒有的話，也沒關係，至少我對自己有所交待。但是，現在這種想法，對今天社會的文化環境已經不適合了。台灣是這樣，在美國也是一樣。首先要有市場，很多美國的暢銷作家銷路幾百萬本，看起來很了不起，其實想起來，有很多也就是璩美鳳那種的。反倒是很多很好的哲學家、科學家有好的意見，並不一定有人知道。文學方面，我在這裡看的，高行健算是不錯的，大陸出來的哈金也不錯。本來我是覺得張賢亮應該是不錯的，結果就不寫了，王猛一開始我就覺得不怎麼樣。

廖：台灣的作家您有注意到嗎？有哪些覺得不錯？

彭：看是看了，廖輝英小姐不錯，七等生我很喜歡，有特色，但是有一點怪，不容易給人家這個……另外，王禎和啦，我最喜歡的是黃春明。鍾肇政我是跟他認識最久，他開始寫作的時候，都是我幫他發表的，幫他改一改，現在他做資政我就不願意了。有個年輕的，叫黃凡，寫得不錯！好像後來也不寫了...。不過，世界日報上好像有報導說他最近又要重新開始寫了。寫作的時期，太年輕時，寫詩也許好，寫小說是不夠的。

廖：您已經很能適應這邊得生活了嗎？

彭：女主人覺得這裡好，好在什麼呢？好在洗衣、燒飯這些問題比在台灣輕鬆。家裡如果沒有病人照護的話，大概也不需要請人。我們家也還好，太喜歡熱鬧的就不行。我在這裡，過去的朋友有時候想請開會、演講，我都盡量算了！我在台灣已講夠了，年紀大了，不講了。書也不教了，現在台灣的大學聽說很多？

廖：很多！學校太多了！有些學校連名字都沒聽過。

彭：太快了！擴展得太快了！在美國看到西方講的所謂的文理教育，也是說不是今天學企業管理、明天學電腦，不是這樣的！基本的還是人文和物理、化學這種所謂的基本科學，這才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。大陸上出那麼大的問題，也就是這樣，假若不是人文教育缺乏，這種人性絕滅的事情應該不會發生。

廖：謝謝接受我們的採訪，下次回台灣，我幫您找好電影看！我們台北見。